

主编 李天纲
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
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·经济学（第五辑）

John Stuart Mill
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

穆勒经济学原理（二册）

〔英〕穆勒（John Stuart Mill）著 郭大力 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主编 李天纲
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
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· 经济学（第五辑）

John Stuart Mill
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

穆勒经济学原理 (一册)

〔英〕穆勒（John Stuart Mill）著 郭大力 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穆勒经济学原理/(英) 穆勒著; 郭大力译. —上海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16

(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/李天纲主编. 经济学)

ISBN 978-7-5520-1199-9

I. ①穆… II. ①穆…②郭… III. ①经济学 IV. ①F0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46295号

穆勒经济学原理 (1-2册)

主 编: 李天纲

编 纂: 赵 炬

责任编辑: 唐云松

特约编辑: 陈宁宁

封面设计: 清 风

策 划: 赵 炬

执 行: 取映文化

加工整理: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

责任校对: 笑 然

出版发行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63875741 邮编200020

<http://www.sassp.org.cn> E-mail: sassp@sass.org.cn

排 版: 上海永正彩色分色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: 常熟市人民印刷厂

开 本: 650×900毫米 1/16开

字 数: 640千字

印 张: 58.875

版 次: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20-1199-9/F.392

定价: 258.00元 (1-2册精装)

民国西学：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

——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序

李天纲

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，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。来自欧美的『西学』，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，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，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。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，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，激发思想，乃至产生新的理论，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。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，公元九、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，有一场著名的『百年翻译运动』之外，还有欧洲十四、十五世纪从阿拉伯、希腊、希伯来等『东方』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，汇入欧洲文化，史称『文艺复兴』。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『西学』，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，称之为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、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并不过分。

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，其实早有前奏。梁启超（1873-1929）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说：『自明末徐光启、李之藻等广译算学、天文、水利诸书，为欧籍入中国之始。』利玛窦（Mateo Ricci, 1552-1610）、徐光启、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，比清末的『西学』早了一百多年。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：利、徐、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、历算等『科学』著作，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《论灵魂》（《灵言蠡勺》）、《形而上学》（《名理探》）等神学、哲学著作。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『西学东渐』之始是对的，但他说其『范围亦限于天（文）、（历）算』，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，直到今天。

从明末到清末的『西学』翻译只是开始，而且断断续续，并不连贯成为一场『运动』。各种原因导致了『西学』的挫折：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；受清初『中国礼仪之争』的影响；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，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。鸦片战争以后很久，再次翻译『西学』，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。从翻译规模来看，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、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，影响力却仍然有限。梁启超说：『惟（上海江南）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十种，李善兰、华蘅芳、赵仲涵等任笔受。其人皆学有根底，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，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、李。』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，但说『戊戌变法』之前的『西学』翻译只在上海、香港、澳门等地零散从事，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，则是事实。

对明末和清末的『西学』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：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，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『西学』，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『翻译运动』。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，数以千计的『汉译名著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。1905年，清朝废除了科举制，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『大学堂』的方式举行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『书院』系统改造而成。新建的大学、中学，数理化、文史哲、政经法等学科，都采用了翻译作品，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，于是，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，即在『四书五经』之外，还必须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『西方经典』，甚至到了『言必称希腊、罗马』的程度。

我们在这里说『民国西学』，它的规模超过明末、清末；它的影响遍及沿海、内地；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，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、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，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，但从一般直觉来看，是可以成立的。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，以及『现代化』、『世俗化』、『理性化』，都与『民国西学』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。然而，『民国西学』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？它是一

个怎样的体系？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？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，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。还有，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，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？『西学东渐』的代表，明末有徐光启，清末有严复，那『民国西学』的代表作在哪里？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，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，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、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的『西学』著作，束之高阁，已经好多年。

举例来说，1935年，上海生活书店编辑《全国总书目》，『网罗全国新书店、学术机关、文化团体、图书馆、政府机关、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』。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，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，分为：『总类、哲学、社会科学、宗教、自然科学、文艺、语文学、史地、技术知识』。一瞥之下，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『人大图书分类法』更仔细，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、学说、学科、流派更庞大。尽管并没有统一的『社科规划』和『文化战略』，『民国西学』却在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。查看《全国总书目》（上海，生活书店，1935），在『社会科学·社会学一般·社会主义』的子目录下，列有『社会主义概论、社会主义史、科学的社会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基尔特社会主义、乌托邦社会主义、基督教社会主义、议会派社会主义』等；在『社会科学·政治·政体政制』的子目录下，列有『政治制度概论、政治制度史、宪政、民主制、独裁制、联邦制、各种政制评述、各国政制、中国政制、现代政制、中国政制史』等，翻译、研究和出版，真的是与欧美接棒，与世界同步。1922年以后的38年的『民国西学』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，而我们却长期忽视，不作接续。

编辑出版一套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，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著作重新刊印，对于我们估计、认识和研究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、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，接续当

时学统，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。1980年代初，上海、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、庞朴先生为代表，编辑『中国文化史丛书』，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『中国文化史丛书』，重振旗鼓，『整理国故』，先是恢复，然后才谈得上去超越。遗憾的是，最近三十年的『西学』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『接续』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，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，诸如控制论、信息论、系统论……还有『老三论』、『新三论』、『后现代』、『后殖民』等等新理论，对『民国西学』弃之如敝屣，避之唯恐不及。

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，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，单靠『严译八种』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，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，几份报刊的主笔。但是，像王造时（1903-1971）先生那样在『西学』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，然后借此『西学』，主编报刊、杂志，在『反独裁』、『争民主』和『抗战救国』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。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《历史哲学》、摩瓦特的《近代欧洲外交史》、《现代欧洲外交史》、拉铁耐的《美国外交政策史》、拉斯基的《国家的理论与实际》、《民主政治在危机中》。1931年，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，文学院院长，政治系主任，后来创办了《主张与批评》（1932）、《自由言论》（1933），组织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』（1932）。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、法治、理性的自由主义；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、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（见王造时著《荒谬集·我们的根本主张》，1935，上海，自由言论社）。非常可惜的是，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、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，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，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，读不到，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。

我们说，『民国西学』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，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『断裂』之后，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，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，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。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，我

人们都没有再去翻看，认真比较，仔细理解。『改革、开放』以后，又一次『西学东渐』，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『西学』，用新的取代旧的，从尼采、弗洛伊德……到福柯、德里达……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：『熊瞎子掰包谷，掰一个丢一个。』中国学者在『西学』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，在层出不穷的『西学』面前特别害怕落伍。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：更新的理论，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，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，或者借用，来解决中国的问题。这种实用主义的『西学观』，其实是一种懒惰、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，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。

讨论二十世纪的『西学』，一般是以五四『新青年』来代表，这其实相当偏颇。胡适、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『西学』，倡导『启蒙』时居功至伟，但是『新文化运动』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，也使得这一派的『西学』浅尝辄止，比较肤浅，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『民国西学』。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有一个宗旨是要『输入学理』，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知识，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，说『我们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便曾经发行过一期『易卜生专号』，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，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《易卜生主义》。《新青年》也曾出过一期『马克思专号』。另一个《新教育月刊》也曾出过一期『杜威专号』。至于对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、日耳曼意识形态、盎格鲁·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，也就习以为常了。』（唐德刚编译：《胡适口述自传》，北京，华文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191页）。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，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『真理』的轨迹。三四十年间，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，到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马克思主义；从不列颠宪政学说，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、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，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，大致就是『输入学理』运动中的全部『西学』。

胡适一语道破地说：『这些新观念、新理论之输入，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

问题。』胡适并不认为这种『活学活用』、『急用先学』的做法有什么不妥。相反，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『西学』的方法论，大多认为翻译为了『救国』，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，这就是『天经地义』。今天看来，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『实用主义』，是生吞活剥，不加消化，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，或曰：是『夺他人之酒杯，浇自己之块垒』。从我们收集整理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的情况来看，『民国西学』是一个比北大『启蒙西学』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认为『五四运动』及其启蒙大众的『西学』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，在大的『启蒙西学』之外，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『民国西学』。或许我们应该把『启蒙西学』纳入『民国西学』体系，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。

我们认为：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，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，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，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，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。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，不中不西，并非简单的外来『冲击』所致，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。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、立场、方案、主张、主义……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，但都要在理解、消化、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，才会有更好的发挥。在这一方面，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，那便是『欲求超胜，必须会通；会通之前，必先翻译』。反过来说，『翻译』的目的，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，而非搬用；『会通』的目的，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，而是一种创新——『超胜』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。二十世纪的『民国西学』，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，值得我们捡起来，重头到底地仔细阅读，好好思考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，献弁言于此，是为序。

〔英〕穆勒（John Stuart Mill）著 郭大力 譯

穆勒經濟學原理

（二冊）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

譯序

穆勒曾在他的自傳上，說明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。他說，他是生在思想過渡時期。他的文筆生活的大部分，是當作獨創思想家的祖述者；他自幼年以來，就覺得他在思想界最宜擔任的職務，是建築橋樑，開拓道路，使已有的真理，聯合成爲一個系統。

沒有別的說明，更能抉發穆勒思想的特質了。他曾謙虛的，否認他自己有獨創的思想系統。是的，亞當·斯密有經濟學創祖的名聲，馬爾薩斯有人口法則，里嘉圖有地租法則，論地位不在他們以下的穆勒，有甚麼呢？有他把當前最上流的經濟思想融化了。他在經濟思想史上能有如此重要的位置，是由於這個原故。他的經濟學原理，數十年來能在英國各大學，成爲最流行的教科書，亦是由於這個原故。

當然，在經濟思想上，他還是亞當·斯密經里嘉圖傳下來的嫡派。他仍維持放任主義的原則，在理論上，保持英國學派的傳統精神。但他已受新時代各種潮流的影響了。亞當·斯密樂觀資本主義社會的將來，馬爾薩斯里嘉圖悲觀社會改造的前途。穆勒是樂觀的，但他樂觀的，是後者，不是前者。

一百年間歐洲經濟思想變遷的迅速，在一個不熟習同時期經濟史的人看來，是異常的。自亞當·斯密至穆勒不過數十年，經濟思想已在一個最重要的方面，改變了。經濟史的變遷，決定經濟思想史的變遷，固不待說；但我們要在此探究穆勒這一個過渡，是怎樣形成的？

穆勒的經濟思想，不可否認的，還以正統學派的思想，爲主要的原素。這所謂正統學派的思想，是由三個來源傳授他的。第一，是他的父親。他在自傳中，曾這樣敘述他研究經濟學的經過。

『就在一八一九年，他叫我修完了經濟學的全部課程。他所親愛的親密的朋友里嘉圖，不久以前，才公刊他在經濟學上劃一大時期的著作。這本書，非有我父親的懇請與激勵，也許永遠不會刊行，或永遠不會著作。……里嘉圖的偉著雖已經印刷，但尚未有任何教科書融會其學說，以便初學者。因此父親才用演講式開始教我這一種科學。這種演講，是我們散步時授我的。他每天解說這學問的一部分，翌日我就把筆錄交給他。這種筆錄，他要我再三改編，一直到明白，正確，並相當完全爲止。我就在這情形下，修完這科學的全部。我每天筆錄所集成的綱要，後來就是他的經濟學綱要的底本。此後，我讀里嘉圖，還是每天作報告，並儘力所能及，討論研究時發生的各種枝題。

『貨幣論是經濟學最繁難的部分，他亦照此方法，叫我讀里嘉圖各種有名的小冊書，那是在硬貨問題喧騰之際寫成的。其次是讀亞當·斯密。我父親要我讀此書的主要目的之一，便是把里嘉圖的更高超的見解，應用於亞當·斯密的更膚淺的經濟學見解上，並教我偵察斯密立論中或其結論中的誤謬。』

第二，是舊經濟學家的直接的薰陶。里嘉圖，這位『有柔和的顏色，親切的態度，對青年很有吸引力』的經濟學家，在他研究經濟學以後，是常邀他到家里去散步，以討論這種學科。他到法國去旅行的時候，又在有名經濟學者薩伊——以亞當·斯密學說傳入大陸的最主要的一位著作家——家中，逗留一些時候。

第三，是邊沁。邊沁自己雖不是經濟學家，但對於經濟學家穆勒極有影響。穆勒在很年幼的時候，就因爲他

是父親的極密切的朋友，常常去拜訪他。他自己曾說：『我以前的教育，從某種意義說，已經在邊沁主義的道路中。……當我讀完立法論終卷時，我這個人就完全不同了。邊沁所思考而在他三卷巨著中所適用的「功利原則」成了一個拱心石，把我知識上信仰上零碎散亂的構成要素，結合在一起。我對於事物的概念，由此取得了統一。我現今有見解了；有一個信條，一個主義，一個哲學了。』功利主義，是他的思想的基礎之一。就在他漸漸背離邊沁主義以後，功利主義亦還是他思想中最重要的要素。

在這樣幾個大思想家的薰陶下，他很早就有著作家的名譽。一八二五年他還不過十九歲，但已能在著名的雜誌上，發表發動一時的論文，暢論當時的商業政策通貨政策了。但不可不重視的，是他的勤奮的自修。就在這一年，他糾合了十數同志，進行一種共同的研究。『每一星期我們集會二次，自早晨八時半至十時，十時以後，我們大多數有日常的職業。我們第一個科目是經濟學。我們選定若干系統的論著作我們的教科書；我父親的「經濟學綱要」是我們選定的第一本。我們用一個人高聲讀其一章，或一較小的部分。然後開始討論，凡有反對意見或其他意見的人，都可起來表示。我們的規則，是每一點無論鉅細，提出之後，均須澈底討論，務求其所得結論，我們各個人都覺滿意然後止。並且，對於每一章或每一次談話所暗示的枝葉的思考問題，亦必解決盡後，方纔停止討論。有時，一個問題我們反覆討論幾個星期。未開會前，我們是用心思考，開會後，我們對於前次朝會提出的新問題，亦竭力求其解決。用這方法讀完我父親的經濟學綱要以後，我們又同樣讀里嘉圖的經濟學原理和白伊勒的價值論。這種綿密的用心的討論，不僅使參加者大有進步，對於抽象經濟學的某一些問題，亦由此產生了若干新的見解。我此後發表的國際價值學說，便發端於這種談話。我在利潤利息論中，所提出的里嘉

圖利潤學說的修正學說，亦是發端於此。」

在這時候，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，亦深有影響於他。他後此認為極重要的人口限制，就是由這時候的研究，導入他的思想中的。他曾說：『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，和邊沁的各種意見，同樣是我們同志間的旗幟和統一點。』總之，穆勒在著作『經濟學上未決諸問題』時，他的思想，尚未超出他父親給他的境界一步。他直接是他父親的學生，間接是邊沁，里嘉圖，馬爾薩斯的學生。

但這個不斷進步的精神中，新的要素是漸漸滋長着。在經濟學原理一八四八年公刊的『第一版，社會主義的難點，是敘述得非常強硬，所以大體說，是帶有反對社會主義的色彩。』一八四九年公刊的第二版，對於社會主義的討論，更重視了。一八五二年公刊的第三版的序文，便明白說，『論所有權一章幾乎完全改寫了。把社會主義當作人類進步之最後結果，我不希望，我反對最有名的社會主義計劃的言論，會被認為是反對社會主義的。』又說：『論勞動階級的未來那一章，更充實了。……這個重要的經驗，說明了工人合作社大擴張並迅速擴張的時機，已經成熟。我曾努力在明白的方法上，指出以合作運動為初步的社會改造的趨勢。』總之，拿他自己的話來說，『我發覺了，所授於我的舊思想構造，已有許多漏洞，我決不讓它就從此瓦解，我心不停工的要把它縫補起來。』穆勒雖始終立在他的舊地盤上，但他接受新思想的熱忱，由這種坦然的自白，活躍躍的表現了。大體說，新思想傳授於他的通路，主要不外下述三者。那就是古律利居派，聖西門派，和他的妻。他說：

『當作一種哲學，我把舊的政治信條放棄了。若有人問我採取甚麼政治哲學體系來代替，我就答說，沒有任何體系；我不過得了一個信念，我覺得，真的體系，必較我前此所知的，更複雜，涉及更多的方面，而其任務亦不

在供給一套模範的制度，而在提供一些根本原理，以演繹適於一定環境的制度。歐洲思想或者說大陸思想的影響，尤其是十九世紀對十八世紀的反動的影響，現在發生到我心中了。這種影響是由許多方面傳來的。第一是古律利居的著作，第二是我所熟識的古律利居的信徒。」

先是，穆勒曾與少數好辯的青年組織一個辯論會。在這個辯論會內，他遇着了古律利居主義者摩里士及斯台林。他們最初是以不同的立場，和穆勒相遇的。他說：

『他們自命爲第二自由黨，甚至自認爲激進黨，但他們的立場和邊沁主義的立場是全然不同的，不僅不同，且正相反對。他們以歐洲反十八世紀哲學的反動學說與思想方法，輸入討論會中。』

他和他們，最初雖以不同的立場相反對，但漸漸的卻發生了親密的友誼，尤其是斯台林。他自己說，『我和他的交誼，超過我和任何其他人的交誼。』

他由這個來源及我們就要講的別一個來源，得了甚麼呢？他自己說他得到了這諸種觀念：

『一、人類精神之可能的進步，有一定的次序，在這種進步上，有一些事情必居在別一些事情之前，政府和社會指導者雖能稍許修正這個次序，但決不能無限的予以修正。二、政治制度的一切問題，都是相對的，不是絕對的，人類進步的不同時期，不僅將有而且應有不同的制度。三、政府常常握在社會最有力分子的掌握中，或移到他們掌握中，不是這種力取決於制度，而是制度取決於這種力。四、任何政治理論或政治哲學，都假設一種人類進步學說爲前提，這種學說便是歷史哲學。』我們就說，這幾點，是穆勒新思想上的主要成素，亦未嘗不可。

然若說古律利居學派對於他是新思想的最初的傳授者，聖西門學派對於他，便是新思想的最有力的傳

授者。他說：

『在他們的宣傳和佈教運動尙繼續時，他們每一種著作我幾乎都讀過了。他們對於自由主義的普通學說之批評，在我看，似乎含有多量的重要的真理。一部分就由他們的著作，我才看見舊經濟學——這種經濟學，認私有財產與遺產制度是不可侵犯的事實，認生產與交換的自由，是社會改良的究極的標語——的價值是極有限的，而且是一時間的。聖西門學徒漸漸的展開了他們的計劃，按照這種計劃，社會的勞動與資本，須爲社會全體的利益而運用，每一個人都必須當作思想家、教師、藝術家或生產者來負擔勞動的一分，一切人都按照他們的能力來分類，按照他們的工作來受酬。』

但他最看重的一種影響，是他的妻的影響。他說：

『關於這兩種科學（倫理科學及政治科學）的結論，無論我在何種形式上接受或創造它們……我的聰明的懷疑態度，都有不小的部分，應在理智方面，歸功於她……與大多數同樣有概括癖的思想家的著作比較，人們常常覺得我的著作，比較更有實行的可能性。這種稱譽，祇有一部分是我應享的。被認爲有這種性質的著作，不是我一個人用心的結果，而是兩個人的心融合的結果。在這兩個人中，有一個人的心，對於遼遠的未來，在預料上是高遠的大膽的，對於當前的事物，在判斷與認識上又是非常切於實際的。』

『在我所著各書中，她參有顯著的成分的，第一本是經濟學原理。經濟學原理「論勞動階級之或然的未來」一章，比其餘各章，皆更有影響於輿論界。這一章便全然是她的貢獻。該書的初稿，是沒有這章的。她指出了這一章的需要，指出了如果沒有這一章，全書必大爲減色。這一章比較概括的部分——關於勞動階級應有狀

況，有兩種相反的理论，這部分，就論述這兩種相反的理论——便完全是解說她的思想，有時簡直是筆述她口述的意思。經濟學中純粹科學的部分，我不是從她學到的。但我這本書有一種情調。我這本書所以能與以前各種堪稱爲科學著作的經濟學解說書不同，我這本書所以能調解以前各種解說書所排斥的精神，就賴有這種一般的情調。這情調便主要是受的她的影響。這情調是甚麼，即指明財富生產的法則與財富分配的方法是不同的，前者是真正的自然法則，依存於物的性質，後者須受一定條件的約束，而依存於人的意志。普通經濟學者認二者有同樣的必然性，不知財富生產的法則，依存於我們地上生存的各種不可變的條件，財富分配的方法僅僅是特殊社會制度的必然結果，僅僅是與特殊社會制度同外延的事物。……前輩經濟學家要在他們所豫想的條件下，用科學方法研究這些原因的作用。在這方面，經濟學原理無殊於其前輩；但經濟學原理不把這些條件看作是究竟的，這是一個創見。不以自然的必然性爲基礎，但以現社會制度的必然性爲基礎的各種經濟法則，我祇承認是暫定的，承認它們會隨社會改良的進步而大大變化。是的，這種看法，有一部分應歸功於聖西門學派的思辨。這種思辨在我心中喚起的思想，使我如此觀。但這種看法所以能浸潤全書，使全書有生氣，而成爲一個活的原理，卻是我妻的鼓勵。……經濟學原理中豫料未來事物的諸事物，沒有她，也許會全然沒有，即使有，我的暗示亦會更怯弱更有限得多。』

以上的敘述，說明了穆勒經濟思想的來源。用他自己的名辭說，在經濟學的靜力學方面，他幾乎純然是里嘉圖的弟子，但在經濟學的動力學方面，他卻是里嘉圖的叛徒。里嘉圖以他假定的社會爲演繹的出發點，忘記了他的假定祇是假定。所以，如果承認他的假定，我們固亦須承認他的結論，但若他的假定消滅，他的結論便亦